

黄 绳

# 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

广东教育出版社



故凡同类者相与也……故  
孔子曰不知足而履之知其不

为著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  
也昭之乎味有同者其

## 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

黄 绳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1插页 139000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406-1693-8/G · 1683

定价2.65元

# 目 录

|                               |     |
|-------------------------------|-----|
| 引言.....                       | 1   |
| 语言艺术的闪光.....                  | 11  |
| 孟子在语言艺术园地里的创获.....            | 11  |
| 形象化的语言使物象显得形神并肖.....          | 26  |
| 多样的比喻把篇章点缀得姿采夺目.....          | 37  |
| 炼字、炼句、创造警句体现了语言运用的功力.....     | 51  |
| 人物描写的草图.....                  | 68  |
| 孟子对人、人性以及人的品质变化的探索.....       | 68  |
| 用各种方式画下人物品格形象的轮廓.....         | 82  |
| 一组“系列故事”——孟子性格、思想的素描.....     | 97  |
| 孟子的自述和自辩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人”的真实面貌..... | 112 |
| 文学体式的创造.....                  | 126 |
| 孟子是使小品文走向成熟和繁荣的先驱.....        | 126 |
| 内容多样、形式别致的小品繁花.....           | 129 |
| 异彩纷呈的古典杂文的诞生.....             | 145 |
| 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短篇小说的雏型.....         | 173 |
| 文学批评的萌芽.....                  | 184 |
| 后记.....                       | 191 |

##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了腐朽的奴隶制度。

在这期间，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大梁、咸阳、邯郸、临淄等大商业城市的兴隆尤令人瞩目。《战国策·齐策》写道：“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在这期间，社会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产生了知识分子阶层——即所谓“士”的阶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而特别在战国时期，各国的兼并战争非常激烈，它们的统治者纷纷罗致学士、策士、侠士，让他们出谋献计，藉以扩张自己的势力，或抵御外来的侵略。“士”的阶层越来越庞大，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有些人“朝为布衣，夕为卿相”，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期间，特别是战国中期，百家争鸣，其势鼎盛。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写道：“自骀衍、马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骀夷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这里所说的齐之稷下，就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所谓稷下先生，

就是系出名门之士。除了《史记》这样描述了当时学术繁荣景况之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诸子书也多产生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位以继承孔子道统、发扬儒家学说为己任的、能文善辩的大思想家孟轲，以及记载他的言行的著作《孟子》七篇。孟子在当时的社会中声誉颇高，他自己也显得气派不凡，往来各国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俨然是一个很具规模的“游说团”、“宣传团”。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记，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曾游说梁（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又游说齐国，仕齐为卿，但齐宣王也不大听信他的话。他便离开齐国，出游滕、鲁等国。那时各国都在讲究变法革新，富国强兵，合从连横，相互攻伐，孟子却讲“唐虞三代之徒”，不符合当时各国统治者的要求，他便“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活到七十多岁，他的一生事业就是宣扬孔子的学说，鼓吹实行“仁政”以王天下；到告老还乡的时候，便在亲密弟子协助之下，撰写回忆录，记下一生言论和行事，垂诸后世。这样说来，《孟子》七篇，是“以立意为宗”，而“不以能文为本”的吧？若照《文选》的编纂者萧统所拟的“标准”，这些文篇都该摒诸文学园地之外，不能在中国文学史占一席位。

不过，把所谓“立意为宗”和所谓“能文为本”绝对地对立起来，都不免失于片面。古往今来就有这样的作者，当他们执笔之初，原先是以立意为宗，即只求表述某一题旨，没有打算把文章写成文学作品，甚至没有打算让文章染上文艺色彩；但是，由于主观方面的爱好、学养，或一时的灵感、偶尔的触发，以及由于客观方面的需要，或时下文风的感染，文章写下来，竟在不知不觉间带有或多或少的文学意味、情趣、色调。何况还有一些作者，即便是在写作以说理为主的文章时，也未尝不是出于沉思，也未尝

不是味乎翰藻？

刘勰在他的名著《文心雕龙》中，有一篇文章专论先秦诸子之文，就是从文学的角度立论，只要它们不乏“华采”和“辞气”，即不因它们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便抹杀它们的文学价值。刘勰之言曰：“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繚，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

刘勰从文学的角度来评论那一系列先秦诸子的文章，涉及它们的内容，而尤着力于分析它们在语言运用、表现手法上的得失。他盛赞孟荀思想内容纯正美好、文辞典雅畅达，管晏叙事精确核实、语言简炼明晰。他赞美文子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特色和优点。他称道列子之书、邹子之说辞采奇丽、想象丰富，别具壮伟的风格。他认为法家慎到、韩非的作品，析理之巧、博喻之富，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只指出墨子、随巢子、尸子、尉繚子的文章质本无文，鹖冠子、鬼谷子的文章辞意隐晦，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刘勰在这段话里没有提到《庄子》，但在他的著作别处说到“庄周述道以翱翔”，大概把他的文风归于“气伟而采奇”、“心奢而辞壮”的一类，无疑是加以肯定的。

刘勰在其著作中以专篇论述先秦诸子散文，虽然语焉未详，却是他研读的成果。他对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作了分析，恰如其份地揭出它们的文学素质、审美价值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今天考察先秦散文时作为借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正好把它作为散文初兴时期的作品来加以考察。它的影响固然及于今天的散文创作，或者说今天的散文作者在《孟子》书中仍可以吸取营养，但时

间相距已在二千年以上，它的面貌自然与今天的散文很不相同，人们理宜着意寻求的，是它在表情达意上、语言琢磨上、体式创造上、风格建立上，等等，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中国文学史上的初期信息。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个问题似乎不好断然作答。不过，如果这里所说的“书”是指文学作品，这里所说的“读其书”是指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某一作品，那么，确知它的作者是谁，并且尽可能详细地了解这位作者的生平、个性、品格、际遇，对了解这么一部作品是很有帮助的。通过作品的阅读，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的作者，而对作者的某些方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对它的作品的了解，包括题材何自而来、主题何由建立、人物形象如何孕育、风格特色怎样形成，等等。即便是对于年湮代远的古代作品，如果能够确认它的作者是谁，不仅有时会使文化史上久悬不决的问题迎刃而解，就是对只求对这作品取得一般了解的人们有时也很有好处。比如说，能够确认《庄子》的内篇和外篇的作者是谁，对《庄子》书中的思想、情绪不相一致之处至少不至大惑不解。

这里就讲到《孟子》吧。上文已提及，《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是说，《孟子》七篇是孟子本人并在“万章之徒”参与之下写成的。但是，古往今来，关于谁是《孟子》的作者这个问题，不只司马迁之一说，而是众说纷纭，颇多争议。《孟子译注》一书的译注者、近人杨伯峻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关于《孟子》的作者，古今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所著。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写道：“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宋代朱熹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题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

得如此好？”又说：“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

第二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的。持此看法的学者，最早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张籍，次为唐人林慎思和宋人苏辙、晁公武，以及清人崔述和周广业等。周广业在《孟子时地考》中写道：“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

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七篇主要是出自孟轲之手而有万章之徒参与。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是这样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以上三种看法中，杨伯峻认为第三种符合历史事实。他说：“我们认为，太史公的话是可信的。他的时代较早，当日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尤其是验之《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其余两种说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关于《孟子》的作者，我们应该对《孟子》全书加以考察，而不能仅抓住一鳞半爪便作论断。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总有其独自の、有异于别一作品的风格。《孟子》就是《孟子》，不同于成书较早的《论语》，也不同于成书较迟的《荀子》，虽然它们的作者都是儒家。《论语》被公认为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之所记，虽然整部作品的内容并无前后矛盾之处，基本上能谐协地反映孔子的思想、感情、风神、举止，但在语言运用上不仅“有长长短短不类处”，而且有意念模糊、不易索解处；在编次上更显得不大讲究组织、结体，留下了不少凭记忆、写札记的痕迹。《孟子》虽然仍是采取对话语录体，在文章体裁上与《论语》同一类型，各章编次也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同样留下了缺少编写计划的痕迹；但这些方面毕竟比《论语》跨前一步，书中多数篇章显得比较完整，特

别是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高昂的调子、一种激越的声情、一种锋芒毕露的气概、一种应对如流的语势。虽然不是各个篇章之间都那么平衡，但总的方面却是这样。朱熹认为“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这句话是有他研读七篇的深厚感受在内的。像这样一部比较成熟的作品，的确很难会是杂凑式的集体写作的产物。

自然，如果再拿《孟子》与《荀子》来比较，则在总体成熟的程度来说，后者又稍胜于前者。因为《荀子》已不采取语录的形式，而把每篇都写成完整的文章，各有主题，又互相联系，使全书呈现为一个体系，文字风格也前后一贯。自古以来没有人怀疑《荀子》是不是本人自著，自然与此有关。

这里仅是就著作体式来作点比较，却似乎在《论语》、《孟子》、《荀子》这三部儒家著作中，已可以看到一个有关著述的发展过程。《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札记式的作品。《孟子》是孟子本人在个别高笔弟子参与下的作品，《荀子》则是纯粹是荀子个人的作品。孟子的著作代表着一个过渡阶段，这是在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回头再说从文章风格来论证七篇基本上为孟子所自著的问题。这里要着重提出的是，文章风格固然与作家的语文知识水平、语言艺术修养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它与作家的品格、气质、个性有关，换言之，文章的风格映现着作家本人的品格、气质、个性的影子。作家的品格、气质、个性不同，他们的文章风格也就会有不同，在形象思维的产物中，这种情况尤为易见。上文提到的《孟子》七篇的文风，怎能不是映现着孟子品格、气质、个性的影子？像七篇这样笔锋凌厉的文章，只有像孟子这样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即便是他门弟子代笔的部分，相信如不经孟子本人加以补充和修正也不会出现全书格调如此谐协的面貌。

清人周广业断言七篇非孟子所作，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以当时的文化条件和著述风气来说，一部书能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怎能就此说孟子就没有这种能耐，绝对达不到这个水平？人们知道，孔子有教无类，广招门徒，课务一定很忙，又要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理，精神负担决不轻可，却仍能抽出时间整理大量的前代和当代的文献，完成一系列儒家经典的编纂工作。春秋时代的一位大知识分子能够在文化上作出如此巨大的业绩，为什么战国时代的另一位大知识分子却一定写不出那么样的、自传式的、几万字的一部书？孟子以“学孔子”为毕生志向，以继承孔子思想学术传统为职责，赋性刚毅，不甘后人，怎能说他在著述不师法孔子？

不过，周广业说《孟子》“非辑自一时”，这倒是值得注意的。可以猜想，孟子在到各国去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以及在过着日常生活的时候，他就随时记下自己的行事经历、思想断片、对门弟子的释疑答问，以及一些有意义的、可以备用的传闻故事等等，这就成为后来所作《七篇》的素材或底稿。等到告老还乡、实行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就复阅多少年积下来的文稿，加以补充、修改、润色，并交给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抄写，也让他们补充一些有关材料，由他作最后的删定，于是一部所谓“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的有独特风格和统一笔致的著作宣告编成。自然，这不过也是一种猜想，或说是一种推论。

这里可还有点补充。一遍又一遍地读《孟子》七篇，一方面固然同意朱熹所说，觉其首尾文字一体，笔势如镗铮而成，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个模糊的印象，即觉其前半和后半（大概划分）在某些方面存在小异。前半的形象化语言略多于后半，后半的说理成分略多于前半。这就是说，在前半作品中，作者较多地进行形象

思维，在后半作品中，作者较多地进行逻辑思维。前半各章写得比较完整、与《论语》的语录式区别较大的多于后半，后半各章只三言两语、迹近《论语》的多于前半。还可以说，前半的文字特别显得笔调流畅、淋漓尽致，后半的文字有部分偏于厚重、似是沉思的结晶。可以猜想，这主要是与孟子本人内心世界的变化有关，也可能是后半出于万章、公孙丑之徒的补记而仅由孟子删定的略多所致。

以上所述，力证《孟子》七篇出于自著，无非为了说明唯有孟子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七篇这样的文章，而且七篇由万章、公孙丑之徒加以小小补充，其笔力可能已有所不及。如果认为《孟子》是出自门弟子之手，那末它决不会是这个面貌，因为不仅在文化修养、政治水平方面，孟子大大高过万章、公孙丑，而且在气质、品格、志向、个性方面，万章、公孙丑之徒与孟子相去很远。

汉人赵岐在《孟子注题辞》中说孟子的文章“长于比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就思想内容来说，“意以独至”确是孟子文章的特点之一。所谓“意以独至”，不仅是说把道理说得很精到，更重要的是说提出了独特的、不同凡响的见解。宋人苏洵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说：“孟子之文，语解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就文章风格来说，“其锋不可犯”又确是孟子文章的特点之一。凡读过七篇的人，大概都深刻地感到孟子的文章感情洋溢，爱憎分明，锋芒毕露，了无滞碍。述说一番道理、解释一个疑问时，或则设喻精巧，启人深思；或则咄咄逼人，势不可当，务求迅速折服他人，而不让他人有反击的机会。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指出：“构成《孟子》散文气势的又一特征，是他灵活多样的辩论方法。……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或虚设实击，先擒后纵；或先来个小小的迂回，造成蓄势，然后展开攻击，紧追不已。”所谓行文如用兵，孟子庶几近之。

孟子文章的特点，就其主观因素方面来说，正是孟子本人的气质、个性所造成的。如果说孔子是一位温良恭俭让、文质彬彬、从容论道的长者，这在《论语》中可以看得到，那末孟子却是一位志高气盛、傲然特立、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社会活动家，这在七篇中也可以明确地看到。

请看孟子的一段独白吧：“说大人，则恭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这就是说，向诸侯进言，就得轻视他，不要把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看在眼里。殿堂华屋、美食女色、饮宴田猎……算得什么！当我得志的时候，也决不搞这一套。我自有比他高得多的志向和操守，我为什么要怕他呢？这就是傲然特立的气概，也是发挥自己优势的想法。

孟子有这样的思想，也就有相应的表现。请看：“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孟子不把梁襄王看在眼里，以至在向别人描述他对梁襄王的印象时，用很刻薄的两句话来表现梁襄王的昏庸，又说梁襄王“卒然问曰”，“卒然”一词把一个所谓国君的庸碌无知、举措失当反映出来了。

再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饿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常设一些问题，让对方回答。问题往往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一步一步加广加深，使对方不自觉地陷入圈套，不由得折服于他的见解之下。这次见齐宣王，用的就是这种手法，从朋友关系说起，说到士师与士的关系，终而问到四境不治则如之何，显然是国君要负责任。但齐宣王缺少自

责精神，不得已便“顾左右而言他”。这里且不谈此语之妙，先要指出这是孟子有意逼出来的，他一点也不顾忌齐宣王如无自责精神，将陷入怎样尴尬的境地。孟子自是由少至长均有所恃才养成这么样的个性和气质，而他生当“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之世，一些客观条件也使他这种个性和气质易于发展和表露。

万章、公孙丑之徒，在对孟子的言行不理解的时候，会向孟子问个明白，在听到外间的人对孟子有所批评和讥议的时候，也会请孟子说明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从《孟子》七篇所记看来，孟子对门弟子所提的这类问题，也还是乐于解答的。他的解答，有时是根据事实，言之成理；有时是作出提示，让弟子进行思考；有时却是迹近强辩，实际上不能自圆其说。但不管是这样的，或是那样的，都已写在七篇之中，可谓直言不讳。可以猜想，七篇如果是在孟子死后纯出自门弟子之手，恐怕那些多少有损于孟子形象的文字不会见于篇章，或者经过涂改，不再是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孟子是一个性情比较率直、胸襟比较开阔、眼光比较远大、思想比较开放的人。他的仁义主张，迂阔而远于事情，所以在当时所如不合，这是他失败的地方，但他所表现的高尚的志向、奋斗的精神、不媚权贵的操守，以及遗留下来的充分表现他的人生高致的著述，却是可以留传永久的。从文学的角度看《孟子》，就不仅会看到孟子在文学上的成就，而且会看到一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古代大知识分子的形象。

## 语言艺术的闪光

### 孟子在语言艺术园地里的创获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就是要在这本经典著作中，看看它的作者孟子在语言的选择、运用、提炼、创造上有什么成就，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看看孟子怎样在语言艺术的宽广园地中，采撷了什么花草来装扮自己的作品，怎样在自己智慧的心灵中进行形象思维，涌出种种人、物、事的形象之流，并用准确、精巧的语言作了从内心到书面的创造，使这些形象对于读者变成具有可感触性，即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也要看看孟子在有关政治见解、人生哲理、社会问题的著述中，怎样藉其高超的智慧和深厚的学养，使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情，或三言两语便震撼读者的心灵，或在精巧的语句中含着令人低回吟味的节奏；此外还要看看孟子所运用的艺术手段，哪一些是继承前代的遗产而有所发展，哪一些则是富有创造性而对后来文苑有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要看看孟子在中国古代语言艺术的发展道路上怎样跨前一步，在语言艺术的园地中怎样栽植了一些美妙的花草，由此认识到孟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同时是一位语言巨匠，从而在读《孟子》七篇时，就不仅在仁义、性善、民贵君轻等思想内容方面进行探究和批判，同时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吟味和思索，并在有关的资料中想象这位语言巨匠的美好形象。这样就会更加觉得，在祖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长河中有所浸淫、有所鉴赏、有所吸取，是一件乐事，甚至是作为炎

黄子孙的一种责任。

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引起了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注意。这篇有名的社论有一段话写道:“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炼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以下还列举了作为语言巨匠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一串响当当的名字,以时代先后为序,孟子便居了首位。社论称他为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又称他为散文家,这是很适当的。

远在战国初期,孟子即以其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在当时新兴的士阶层中出类拔萃。其后世二千多年来,《孟子》七篇不仅作为儒家经典为学者所钻研,而且作为语文教科书广为学童所朗读、背诵。孟子的散文继承了先代作品的优长,同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把散文中的语言艺术水平提高一步,虽然孟子本人并没有自觉地把七篇当作文学作品来撰写。关于这个方面,先述如下三点:

### 一、发展了生动活泼、通俗流畅的文风。

中国古代第一部散文集是《尚书》。它是一些誓词、政治文告、贵族告诫之词等等的结集,据说是商代及西周时代的作品,却渗入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章。其中文字流畅的篇章如《汤誓》,很可能是经过后人润色的。另一些文字如《顾命》等,运用了生动的比喻和有条不紊的铺叙,显得有点文学价值。但其中重要的文篇,如《盘庚》、《大诰》、《洛诰》等,却都是佶屈聱牙、文词艰涩的。虽然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被老师问及读《尚书》后的体会时,说了“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的话,却可能是不大老实的,而且至少只有极少数钻研古书的人才能有这种感受。刘勰说“《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一方面承

认《尚书》辞意不够明确，一方面又说经过诠释就全部可以理解。这也仅是对少数人才说得过去，《尚书》本身的文字艰涩毕竟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认为，《尚书》里面的作品，它难懂的原因，“不是太文言，而是太白话。因为用的是当时的口语，时间过久了，后代读起来就难懂了”。这有一定的道理，可以成为一说。不过，我们猜想，在殷商、西周之世，社会文化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的思维能力还很有局限，思想、意念可能还比较单简，作为表情达意工具、或说观念外壳的语言自然也比较质朴，不那么明确，更不会丰富，加上书写的工具和材料有很大的限制，以致在把什么笔之于书的时候，意念表达不那么明白清晰，书写又不免于错漏失误，而且只有少数才智之士才能在遣词造句上间或显露较高的技巧，其它的人就缺乏把口语加以润色的能力。这样，当时产生的作品，大部分不免于晦涩板滞，甚或文理不通，反而比不上口耳相传、此唱彼和的民间歌谣来得生动活泼、多姿多采，原因就在于此吧？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尚书》就其文章体裁来说是一部散文集，就其内容实质来说则是一部最古的官家史书。《春秋》是孔子据官家的史实纪录加以删订的、中国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历史著作，以文辞简洁、含义深刻取得一定的文学价值。在语言艺术的造诣上，《春秋》自然比《尚书》为高，但缺少新的突破。

所谓文辞简洁，有时却不利于形象表现。如僖公十六年：“殒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公羊传》云：“曷为先言殒而后言石？记问，问其殒然，视之为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鷁？六鷁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鷁。徐而察之，则退飞。”前一句只有五个字，后一句七个字，却都记下了一件完整的事，简炼到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正是刘勰所谓“字不得减，乃

知其密”。但是，一般读者读到这两句，如果没有看到《公羊传》的解释，就可能都只认识到有这么两件事，而无由借想象和联想让那么样的两个形象在脑中出现。简洁是的确简洁到不能减一字，可是连读者在读书时的心理活动都被剥夺净尽，这作为史书上的记事，也未必是高明的做法，如以文学创作的要求来加以衡量，就很可能被给予负面的评价。

所谓含义深刻，研究《春秋》的学者从来就很重视所谓“《春秋》笔法”、所谓“微言大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墨；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刘勰等崇“五经”，对《春秋》极赞其一字之褒贬，却也说它“睿旨幽隐”。实际上所谓“一字见义”固然可理解为语言的准确、精练，但追探“微言大义”，随人而异，也可见辞意隐晦，难以捉摸吧？

《春秋》问世之后，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家传出现，而以《左传》的成就为最大。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左传》在语言艺术上有新的创造，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高居首位的杰作。它以流畅的语言、饱含感情的语调、明晰的、有层次的叙述方法，描述社会上的复杂事件，对于当时几个关系重大的战役，更写得脉络分明、紧凑生动、有声有色。《左传》是记事的书，大体上按《春秋》衍成，所谓“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但作者的语言艺术已伸展到人物描写的领域，这正如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所说：“《左传》对人物性格也刻画得很生动，子产的善于辞令、敢作敢为，华元的庸懦无能、而待人宽厚，子玉的骄横，公子弃疾的阴险，郑庄公的伪善，无不跃然纸上。”

刘知几《史通·杂论上》有一段话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谄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凜若秋霜；叙兴邦则滋